

南宋士人的鄉里師友與地方關懷—— 以孫應時為例

黃寬重*

孫應時是南宋中期的中階士人官僚。他和宋代眾多士人一樣，在追求舉業與仕進的不同階段，廣泛接觸不同類型的人物，努力經營人脈。從孫應時的《燭湖集》可看到與他交往的士人，有姓名可稽者超過 230 人，成為了解像孫應時這樣沒有赫赫聲名的士人官僚生命歷程的最重要資源。透過這些資料，不僅能掌握他們彼此的關係、共同關懷的議題與遭遇，也可以對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發展有更深刻的了解。家庭環境與鄉里關係，是了解宋代士人早期成長過程、建構鄉里人際網絡及關懷鄉里的重要基礎。以孫應時而言，與他交往的人物中，有籍貫資料可稽的人有 147 人，其中隸籍紹興府的超過三分之一，他的餘姚同鄉則有 32 人。在孫應時五十三年生命中，超過一半的時間居住於鄉里，可以說紹興府或餘姚縣是孫氏父子建立人際關係最重要的地方；那麼他們與鄉里人士交遊、互動與關係，均對了解孫家，特別是孫應時的成長與鄉里關懷極為重要。在宋代，特別是南宋，像孫應時這樣受惠於科舉而崛起的中低階層士人官僚，其鄉里活動與人際關係，可資討論的資料相當少，因此，孫應時《燭湖集》這樣的個人文集，就顯得彌足珍貴。本文討論重點放在孫應時的鄉里——浙東路紹興府，透過孫應時早期成長階段建立的鄉里因緣與人脈關係，觀察對其爾後學宦成長的影響，以及關懷鄉里的基礎。

關鍵詞：孫介、胡宗伋、紹興、鄉里師友、地方關懷

* 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講座教授

一、前言

孫應時(1154-1206)是南宋中期的中階士人官僚。他和宋代眾多士人一樣，在追求舉業與仕進的階段，廣泛接觸不同類型的人物，努力經營人脈。從現存孫應時的著作《燭湖集》可看到與他交往的士人，有姓名可稽者超過 230 人，這是了解像孫應時一樣沒有顯赫偉績的士人，唯一可憑藉的重要資源。透過這些資料，不僅能掌握他和這些人的關係、關懷的議題與遭遇，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對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發展現象，有更多的了解。

家庭環境與師友關係，是了解宋代士人早期成長過程、建構鄉里人際網絡及關懷鄉里的重要基礎。以孫應時而言，與他交往的人物，有籍貫資料可稽的人有 147 人，其中隸籍紹興府的人有 53 人，小同鄉餘姚縣則有 32 人。紹興或餘姚，都是孫應時父兄學習舉業的起點，也是他們一生最主要的活動區域。即以有仕宦經歷的孫應時為例，他在十九歲以前(1154-1172)、淳熙二年(1175)到五年(1178)在家待闕、淳熙十五年(1188)至紹熙元年(1190)的兩年多守喪，以及慶元六年(1200)至開禧二年(1206)奉祠的七年，總計超過三十年的時間，都以紹興為主要活動地區。可以說紹興是孫氏父子成長與建立人際關係，最重要的地方。那麼，他們與鄉里人士交遊、師友互動的情況，對了解孫家，特別是孫應時的成長與鄉里關懷，有密切關係。

本文討論的內容以孫應時的《燭湖集》所見資料為主。由於孫介與孫應求、孫應符三人交遊的資料很少，無法構成討論議題，因此本文以孫應時文集及其父孫介(1114-1188)的傳記及相關族譜資料，作為分析討論的基礎，且集中於與孫氏關係較密切的若干個人與家族，其他人物則於必要時納入討論。

在宋代，特別是南宋，要探討像孫應時這樣中階士人或家族與鄉

里的關係，可資利用討論的資料相當少，因此，孫應時的《燭湖集》，就成為探討其鄉里關係與情懷的珍貴資料。本文希望透過對文集的深度挖掘，有助於了解南宋一般士人參與鄉里政治、文化活動的樣貌；討論的重點，放在孫應時居址所在的鄉里——南宋浙東路紹興府。

二、家境與儒業

奠定餘姚燭溪湖孫氏的發展，以及開啟了孫應時仕途基礎的，是他的父親孫介。關於餘姚燭溪湖孫氏的先世與遷徙過程，光緒二十五年(1899)刊《餘姚孫境宗譜》，¹將之上溯至五代後唐三司使孫岳，由睦州徙居餘姚之梅州，但世系不明，難以徵信。²據孫介七十歲自述生平時說：「族緒寒微，難援譜系，但聞五代祖自睦州徙居此，力田自業。」³若以三十年為一代，則孫氏先祖遷居餘姚的時間約在唐末五代，與孫岳時間相近，但其記載所及的先人是曾祖孫亮，並非孫岳的後裔。

孫家由農轉儒的關鍵是孫子昇。遷至餘姚的孫氏原以務農為主，沒有餘力讀書業儒；到孫介的大伯父子昇，才有所改變。子昇曾出家為僧，也曾跟隨儒生讀《論語》、《孟子》、《詩》、《禮》等經典，喜聽儒士言論，後因營葬父母墓墳，返鄉守喪，才有「慨然蘄變其家為儒」的想法，⁴聚集中子姪教授《論語》、《孟子》等書。這一作法，既開啟孫氏家族由農轉儒的契機，也與以致力儒業聲聞鄉里的

¹ 孫仰唐纂修，《餘姚孫境宗譜》。

² 童銀舫認為此說不足信，宜以孫介之說為是，見童銀舫，《慈溪家譜》，頁39。

³ 樓鑰，〈承議郎孫君并太孺人張氏墓誌〉，收入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7上；樓鑰著，顧大朋點校，《樓鑰集》，卷114，〈承議郎孫君并太孺人張氏墓誌〉，頁1974。

⁴ 沈煥，〈承奉郎孫君行狀〉，收入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1下。

鄉先生胡宗伋一家，締結了長達百年的師生，乃至婚姻關係。關於此事，孫應時女婿胡衍(胡沂孫)，在嘉定十六年(1223)跋其曾祖母莫氏〈胡氏賢訓編類〉一文中，有所記錄：「定翁先生(胡宗伋)以儒業為鄉里師，雅惡浮屠氏。一日出行，聞誦書聲，即之，則有僧廬墓，教授童子以《語》、《孟》也，問焉，曰：『吾雖釋，而甚慕儒，此吾猶子，貧無以教，姑發蒙耳。』定翁先生忻然納諸家塾。」⁵

奠定孫氏儒業的則是孫子充的長子孫疇(1099-1132)與次子孫介。孫疇，字壽朋，一字不倫，⁶生於元符二年(1099)，自幼聰穎有大志，甚得其伯父子昇之意。子昇為改變家風與族人命運，除自身督教之外，更於宣和二年(1120)命壽朋率諸弟受學於胡宗伋。宣和五年(1123)胡宗伋全家進京爭取功名，孫疇應宗伋岳家莫氏之邀，督促莫氏子弟研習舉業。胡宗伋關切孫氏兄弟與莫氏子弟學習的情況，曾有書信督責壽朋：「立志剛遠，慕先聖，晷毋晷寢，群居起敬，忌苟同俗」，並說「汝前報吾苟且學作文字，君子無一忘敬，苟且何等語，後不得復爾」，辭義周懇。孫壽朋受教，勇於改進，以至鄉里長者有「萬金可有，孫壽朋不易得」的讚譽。⁷及宣和七年(1125)，金人攻陷開封，胡宗伋夫妻攜子返鄉，孫氏兄弟再受教。⁸紹興二年(1132)秋，壽朋以三十三歲之年遽卒。孫應時曾向沈煥說起孫子昇與孫疇開啟孫家儒業基礎：「吾伯祖開吾家儒學之端，吾伯父植立為儒之事業。」⁹這是對孫氏家族興起總結性的話。

5 胡衍，〈胡氏莫夫人賢訓編類跋〉，收入胡洪軍校注，《胡氏家訓》，頁20。

6 孫仰唐，《餘姚孫境宗譜》，卷3，頁4上。

7 沈煥，〈承奉郎孫君行狀〉，收入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1下-2上。

8 參葉汝士，〈宋故太宜人莫氏行狀〉，收入胡洪軍校注，《胡氏家訓》，頁24；孫介，〈胡氏賢訓編序〉，收入胡洪軍校注，《胡氏家訓》，頁17。

9 沈煥，〈承奉郎孫君行狀〉，收入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5上。

傳承及發揚孫家儒業的孫介，是孫子充的幼子，過繼於其弟子全。孫介，字不朋，號雪齋先生，自四歲即追隨大他十五歲的長兄孫疇出外讀書，七歲受教於鄉先生胡宗伋（約當宣和二年），十歲時，胡宗伋攜妻莫氏與子胡沂赴開封準備應試，孫介隨兄到莫氏鄉館，與莫氏子弟共同學習，「寓鄉館側聽講說」，粗通文義。¹⁰孫介在莫家前後二年，但覺「退侶燕朋，弛怠不進」。金兵陷開封，宗伋全家歸鄉，孫介再受教於定翁。十四、五歲喜誦詩，孫疇教他讀《杜工部文集》，十八歲始學舉子賦，準備應舉，不意孫疇英年早逝，孫介「哀痛之情如失乳哺，如割肺腸，俛俛無相，幾不自立。」¹¹後與畏友厲德輔肄業於紫溪書院。後因困於家計，放棄學業，繼其兄於鄉里教學，以維生計，同時自讀經史注疏。孫介雖因家計，放棄科舉功名，但為感懷先伯與兄長振興家族儒業的心志，盡心栽培家中子弟；對三個兒子應求、應符、應時的教導尤為用心。¹²

中年以後，孫介更專心培育其子弟。孫介為支撐家計，擔任鄉先生，深感外出寄食，收入微薄，且漂泊在外，不利三子的成長，於四十歲時毅然謝別主人，捨館歸訓；卻因收入短少家境窘困，於乾道五年（1169）賣五畝田以支持家計。孫介親自抄錄諸經正義、諸子書、戰國策、兩漢至隋唐五代史、白氏文集、異聞、雜說等典籍，以備教學及自娛，並秉持胡宗伋的理念，教育子弟，希望「凡吾子孫，勿墜家學，

¹⁰ 參見孫介，〈胡氏賢訓編序〉，收入胡洪軍校注，《胡氏家訓》，頁 17 下；及樓鑰，〈承議郎孫君并太孺人張氏墓誌〉，收入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 7 上；及葉汝士，〈宋故太宜人莫氏行狀〉，收入胡洪軍校注，《胡氏家訓》，頁 24。

¹¹ 樓鑰，〈承議郎孫君并太孺人張氏墓誌〉，收入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 7 下。

¹² 沈煥，〈承奉郎孫君行狀〉，收入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 2 上。

推本源流，念之敬之。」¹³在他的辛勤下，三個兒子都獲得良好教育，長子應求於淳熙四年(1177)中鄉選，幼子應時則先於乾道八年(1172)入太學，並淳熙二年中進士，是孫氏成員入仕之始。

三、鄉里關係的萌發

自孫子昇到孫疇、孫介兄弟二代，是孫氏學習儒業與開展人際關係的第一步。這兩代的人際關係，可以分成二個部分說明：一是從子昇起學習儒業所建立的人際關係，主要是受教於同鄉胡宗伋所建立起長達四代、超過百年深厚的師生與姻親情誼。

胡宗伋(1071-1140)是餘姚燭溪湖人，為人慷慨有節氣。他一生致力舉業，認為只要努力，富貴功名可以捨棄，多次參加鄉試不中，逕赴開封太學肄業，又無成。返鄉後，因慕前輩開義學之風，在妻子莫氏支持下，以儒業為鄉里師，闢館舍，率宗族鄉里子弟有意於學者，不問親疏，提供飲食生活資源，教誨課業。胡宗伋對孫壽朋的言行舉止特別讚賞。宣和五年，宗伋為有利長子及自己的舉業，變賣家產，攜同妻子到開封。¹⁴胡氏行前，莫氏請二十五歲的孫疇到莫家擔任教席，教育其弟姪，孫介隨同學習。

旅京期間，胡宗伋與莫氏甚關心孫疇與莫氏子弟學習情況。宗伋與莫氏均曾多次致書關心孫疇的學習與教學；莫氏在給她二位弟弟彥昭與安夫的書信中，關切諸子姪學習情況，多次稱讚孫疇和孫介，說「八二姪已是年紀長大，今更得孫十八哥(按即孫疇)琢磨教誨，想自知理趣，勉力修進，不待姑姑之言也……二姪既得十八哥善誘，且須早

¹³ 樓鑰，〈承議郎孫君并太孺人張氏墓誌〉，收入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9下；王孫榮，〈孫應時〉，頁202-207。

¹⁴ 葉汝士，〈宋故太宜人莫氏行狀〉，收入胡洪軍校注，《胡氏家訓》，頁24。

夕精勤，無至怠惰，以期自進……八四姪更得廿七郎(孫介乳名)相輔，亦有濟事也」，又說「若如八二姪、八四姪正好讀書，更須常委十八哥痛責，及吾弟偷閒更與檢點，庶幾不敢怠慢」，又說「八二姪年紀是不小……茲孫十八哥最好處，只為自家勤篤，其次又能鞭迫諸弟，所以各有成就之。」¹⁵可見孫疇在莫宅，除了協助莫氏教導其子弟，兼能自修，及讓年幼的孫介有隨讀的機會。這兩年的機緣，讓孫疇兄弟與胡宗伋及莫家建立起親如父子兄弟的師生關係。

胡宗伋於宣和七年，率妻小歸鄉，建義學於自宅，名為「滕軒」，鄉里學者多從之游。高宗南渡之初，中原紛亂，北方士人避地四明、紹興者，多以宗伋為依歸，宗伋極力照顧，使他們不致顛沛無所。再度入館受教的孫介，有緣結識群儒，也對宗伋夫婦勸諭督促子弟親舊及以志學為念的用心，深有體會。他認為自己所學雖淺，但宗伋的教導甚深，因此終身力行恩師信念。胡、莫二家子弟將所藏莫氏致子弟的信札，及家訓 120 條，加以彙輯，於紹興三十年(1160)四月，由孫介編輯出版，名為《賢訓編類》，以比於曹氏女戒，作為「私服深情並將規範後裔」。¹⁶這冊家訓先後得朱熹(1130-1200)、蔡沈(1167-1230)題跋，收入《光緒本孫境宗譜》及胡金城輯訂的梅州胡氏敦裕堂刊刻的《梅州胡氏宗譜》中，今有單行本，名為《胡氏家訓》。¹⁷

胡宗伋在元符二年以經義中鄉貢，但省試屢敗，及至紹興二年得特奏名進士出身，先後任京西南路房州文字、瀏陽縣丞，兼嚴州比較

¹⁵ 莫氏，〈再寄弟姪書〉，收入胡臨川編，《餘姚柏山胡氏宗譜》，卷首上，頁 1 上-2 下。

¹⁶ 孫介，〈胡氏賢訓編序〉，收入胡洪軍校注，《胡氏家訓》，頁 17。又見沈煥，〈承奉郎孫君行狀〉，收入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 2 下。

¹⁷ 胡洪軍校注，《胡氏家訓》。

務、德興縣丞等，死於紹興十年(1140)八月，享年七十。¹⁸後因長子胡沂恩，贈為右大中大夫。

另一方面。孫疇、孫介兩兄弟，也藉著教育鄉里子弟，開拓人際關係。孫介曾說：「吾之族親固少，其業儒者尤少，業儒而可共學者又加少。」¹⁹兩兄弟均以寄食教書為主。孫疇除上述任餘姚富室莫家教席約二年外，多在家鄉任教，他死後，孫介繼為鄉里童子師。孫介秉持胡宗伋的教學原則，務為實學，孫應時就說：「余先君子雪齋先生終老為童子師，其法度必準於古，不以一毫自愧。」²⁰孫介所教的對象包括莫氏家族，²¹兩家後來甚至有姻親關係。莫及自小追隨雪齋先生，其子幼明兄弟也唯孫應求兄弟是依。²²孫介教書遵守古道，不以科舉時文為尚，鄉里人常視為迂闊，但同縣富室李揚知其名，乃延聘至家塾，教諸子弟，其子李友仁(1156-1204)，親孫介之學，自此與李氏父子結為知己；孫應時亦與友仁為兄弟交。²³孫介也曾至鄉里富室茅氏的私塾，教授其子茅宗明舉業，與茅氏建立相當不錯的情誼。

孫氏家族自邁向儒業，即與鄉里賢達建立了人際關係。在孫疇、孫介兄弟二人成長過程中，因著胡宗伋的教誨與提攜，既奠下家族向儒學、習舉業的基礎，也開啟了與鄉里前賢密切的人際關係。而後，二人先後教授鄉里子弟，與當地富室、名族有良好的互動，此一關係的建立，雖終孫疇、孫介兄弟在世時，未見具體成效，但在孫介的三子應時往後的學習與仕宦歷程中，得以開花結果。

18 參胡臨川，《餘姚柏山胡氏族譜》，卷下，〈定翁公事實節要〉，頁2上。

19 孫應時，《燭湖集》，卷13，〈祭表姪莫幼明秀才文〉，頁14上下。

20 孫應時，《燭湖集》，卷10，〈跋汪立義教童子訣〉，頁18下；時為慶元四年(1198)。

21 孫應時在〈挽莫子晉文〉中即說：「吾父古君子，公家賢主人。」孫應時，《燭湖集》，卷17，〈挽莫子晉文〉，頁3下。

22 孫應時，《燭湖集》，卷13，〈祭表姪莫幼明秀才文〉，頁14下。

23 孫應時，《燭湖集》，卷12，〈李叔文墓誌銘〉，頁8上下。

四、鄉里師友關係的開展

燭溪湖孫氏，經歷二代學習儒業，雖然未能躋身鄉里望族，卻已在邁向儒業及開展鄉里人際關係上，奠下重要基礎。到孫介的兒子一輩，特別是孫應時，除在科舉功名及理學追求上，締造佳績外，在鄉里人際關係的營造，也較之父祖輩更為寬廣。

學習舉業是孫應時開拓鄉里關係的第一步。孫應時學習成長的過程與其父親孫介密不可分。孫介早期較多是到不同的家族座館授徒，過著寄食的生活；孫應時童年除接受同鄉的魏子明啟蒙外，²⁴多隨父親到其教書的李家、茅家與莫家聽講受教，除了親炙父教外，也與這三家的子弟，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孫介擔任李揚諸子的教師，深獲李揚的肯定，被視為知己，應時也與小他一歲的李友仁為兄弟交，後來進而與友仁的從兄李友直為太學同學、進士同年。李友直是史浩的女婿，應時受聘東湖書院教書，或與李友直(1134-1199)推薦有關。孫應時十二歲左右，隨父親至茅家研讀，可能也協助教學，讓他與長他十一歲的茅宗明(1143-1203)結下良好關係。²⁵進而得與另一位茅氏族人茅唐佐，即餘姚名臣陳橐(1190-1155)的外甥密切互動。慶元二年(1196)知餘姚縣施宿(生卒年不詳，紹熙四年(1193)進士)上任後，²⁶孫應時建議推動義役，獲茅唐佐(宗愈)與孫宗廣等人協助，終能完成餘姚的義役體制。²⁷

孫應時與餘姚莫氏的關係，也肇因於孫介任莫氏家塾教席。餘姚

²⁴ 孫應時，《燭湖集》，卷13，〈祭魏子明先生文〉，頁7上。

²⁵ 孫應時，《燭湖集》，卷12，〈茅從義墓誌銘〉，頁12下-14上。

²⁶ 孫應時，《燭湖集》，卷12，〈茅唐佐府君墓誌銘〉，頁10下-12上。

²⁷ 孫應時，《燭湖集》，卷8，〈與施監丞宿書〉，頁15下-16上；卷9，〈餘姚縣義役記〉，頁23上-25下。

莫氏與山陰莫氏為近族，自莫及(字子晉，1123-1199)起，自力興家業，延師教授族內子弟，「塾舍常有名師，日延賓客為文字飲，取有益於子弟；里中義事，踴躍先之，忘其力之不足？」²⁸孫應時〈挽莫子晉文〉即說：「吾父古君子，公家賢主人，一門常旅拜，三世極情親」。²⁹孫應時有感於莫氏對他的厚待，為莫及作墳記，也為莫及從兄弟莫友的妻子葉氏撰墓誌銘。³⁰孫氏與山陰莫叔光(生卒年不詳，隆興元年(1163)進士)、子純(1159-1215)叔姪的關係不甚清楚，但大約紹熙三年(1192)以後，孫應時曾有一書感謝莫叔光的推薦，稱之為「尊兄」，自稱「鄉曲昆弟」；³¹其姪莫子純，字粹中，因為叔父叔光恩授官，慶元二年試禮部第一，任簽書平江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³²孫應時大約在次年，給其同學，時任都運提刑華文檢詳的石宗昭信中，提到莫子純和其表兄，山陰人虞貫卿；³³慶元五年(1199)三月，在給由池州教授罷歸平江的老友周南(1159-1213)的信中，再次提到在平江任簽判的莫子純，並且介紹在衙廨任事的虞貫卿。³⁴莫子純生於紹興二十九年(1159)，小孫應時十五歲，他們相認定交情形，是否與莫友、莫及有關，難以確定；但二人的關係顯然頗佳。莫叔光、子純叔姪的籍貫，多作山陰人，光緒二十五年版《餘姚縣志》、《乾隆志》及《弘治府志》則認為是餘姚人，唯不敢遽定其籍貫，而將他的事蹟列入《餘姚志》中。³⁵

孫介的三個兒子：應求、應符與應時，都曾在鄉里教書。孫應求

28 孫應時，《燭湖集》，卷12，〈莫府君墳記〉，頁21下-22上。

29 孫應時，《燭湖集》，卷17，〈挽莫子晉文〉，頁3下-4上。

30 孫應時，《燭湖集》，卷12，〈莫府君葉夫人墓誌銘〉，頁15下-20上。

31 孫應時，《燭湖集》，卷8，〈與莫侍郎叔光書〉，頁8下-9下。

32 張湜，(寶慶)《會稽續志》，卷5，〈人物〉，頁7146。

33 孫應時，《燭湖集》，卷5，〈與石檢詳書〉，頁19上下。

34 孫應時，《燭湖集》，卷7，〈寄周正字書〉，頁25上下。

35 周炳麟，(光緒)《餘姚縣志》，卷23，〈列傳四〉，頁9下-10下。

與應符兩兄弟終生任鄉先生，關於他們的學生資料甚少，僅知餘姚富人孫洋曾請孫應求擔任家塾的教席，教其子弟，兩家約為宗親。³⁶

孫應時與受教的鄉里子弟，關係甚篤。他雖追求舉業，在外任官時間不少，但也曾於鄉里教學。他在淳熙二年至五年鄉居待闕，及淳熙十六年(1189)至紹熙元年守喪期間，曾教授學生，因此有不少鄉里子弟與他有師生情誼。鄉里青年李知仁就是一例。孫應時中進士後待闕期間，在種山紹興府學教書，培養了一批年輕士人，鄉人李知仁雖尚未到讀書年齡，即已親近應時。淳熙十年(1183)，應時卸黃巖尉之職回鄉，李知仁不遠百里徒步追隨受業，「於是束衣羸糧，相與讀書於蓬藿荒莽之中。余上下城邑，生輒隨之不舍，觀其學，雖未能大進於舊，其望予之歸之勤，親余之篤如此，亦可謂有志者矣。」³⁷說明兩人的關係密切。淳熙五年，他離鄉赴黃巖縣尉之任時，有〈別越中諸生〉的七言絕句，說自己在紹興教書是「三年一榻占清閒」，期望學生「洗心深讀聖賢書」。³⁸淳熙十二年(1185)十月，孫應時離開四明史家，準備到泰州接任海陵縣丞，路經家鄉會稽時，昔日的學生聚在魯墟橋以酒送別，他曾有詩表達對前程的感慨。³⁹後來他也給紹興府學陳教授寫信，推薦幾位在府學表現很優秀的鄉里青年士人，包括杜鎮、虞樞、諸葛興以及孫康祖、馮幼安、諸葛肖卿等學職人員，其中杜鎮、虞樞二人，先後受教於他與葉適(1150-1223)，孫康祖則是他的學生。⁴⁰從這三個例子看來，孫應時和他的鄉里學生，關係相當融洽。

³⁶ 孫應時，《燭湖集》，卷 12，〈孫承事墓誌銘〉，頁 4 下-6 上。

³⁷ 孫應時，《燭湖集》，卷 10，〈李生名字說〉，頁 23 上。

³⁸ 孫應時，《燭湖集》，卷 20，〈別越中諸生〉，頁 3 下。參見王孫榮，〈孫應時〉，頁 210。

³⁹ 孫應時，《燭湖集》，卷 16，〈冬十月赴官海陵過會稽諸生飲餞魯墟橋，酒罷就舟倦甚眷然有作〉，頁 6 上。

⁴⁰ 孫應時，《燭湖集》，卷 6，〈與陳教授書〉，頁 13 下-15 上。

最能展現孫應時的師生情誼的是，山陰司馬氏父子。司馬儼是司馬光(1019-1086)家族的後人，字季若，曾知海陵縣，淳熙十三年(1186)，孫應時到海陵縣任縣丞，曾致書知縣司馬儼，說「託交雖舊，為隸則新」，⁴¹顯示二人相交甚早。光宗(1147-1200)即位，孫應時替司馬儼繕寫其從曾祖司馬光的四件奏札，進獻給光宗作為登極的賀禮，⁴²也為司馬儼在海陵所建草堂定名「不欺堂」，以及為他七個兒子給字作〈說〉。⁴³因此當司馬儼死時，孫應時挽詩中即有「越絕粉榆社，吳陵松竹間，相親逾骨肉，每見豁心顏，契闊今生死，蕭條舊往還，春風數行淚，吹度鏡湖山」，⁴⁴說明關係密切。司馬儼三子司馬述是孫應時的學生。寶慶三年(1227)《燭湖集》彙集出版，時任浙東提舉的司馬述寫序，即自稱「門人」，說明從學經過，「述獲在執經之列，丙午歲(淳熙十三年)先人宰海陵，先生適丞是邑，尤得朝夕侍左右」，文中說「獲在執經列」，是甲辰(淳熙十一年，1184)，司馬述或在東湖書院與史彌遠(1164-1233)兄弟共同受教於孫應時。⁴⁵二人師生情誼甚深，司馬述任平江司戶參軍時，孫應時有詩相送。⁴⁶嘉泰二年(1202)九月，司

41 孫應時，《燭湖集》，卷3，〈通海陵司馬知縣儼啟〉，頁8下-9下。

42 孫應時，《燭湖集》，卷1，〈賀光宗皇帝登極代司馬儼進文正公奏劄表〉，頁5上-6上。

43 孫應時，《燭湖集》，卷10，〈司馬氏七子字說〉，頁24下-26上；〈海陵縣齋不欺堂說〉，頁26上下。

44 孫應時，《燭湖集》，卷16，〈挽司馬季若知郡〉，頁23上下。

45 司馬述，〈《燭湖集》原序〉，收入孫應時，《燭湖集》，卷首，頁1上下。司馬述是否在四明受教，與史浩家關係如何？未見直接資料，但北宋末開封名族姜氏居四明，姜浩長女是司馬儼妻子，司馬述母親；三女則是史彌遠的妻子，則司馬家與史家有連襟關係，見樓鑰著，顧大朋點校，《樓鑰集》，卷114，〈贈金紫光祿大夫姜公墓誌銘〉，頁1978。樓鑰(1137-1213)說淳熙十三年(1186)司馬儼知泰州，當為知泰州海陵縣之誤。

46 孫應時，《燭湖集》，卷16，〈送司馬尊古赴平江戶掾〉，頁9上。

馬述也將家藏薛紹彭臨寶章帖，送請孫應時鑑定。⁴⁷孫介在淳熙十四年(1187)作〈丁未仲夏賞月〉詩前有序說：「(介)今寓海陵，已七十四，適邑長官司馬父子合席諧飲」，⁴⁸司馬述說：「述在海陵時，嘗升堂拜雪齋老先生，見手編家庭唱酬集……是歲雪齋有賞月詩，先人與述兩兄，亦相與賡韻。」⁴⁹述說兩家兼具師生與同僚的深厚情誼。

至於孫應時其他的鄉里師友，則有趙師龍與高公亮、方宗厚、宗昇(1143-1200)兄弟、王永富等人。方氏居所的橫塘鄰近孫家，全家以勇猛著稱，曾協助沿海制置使趙子瀟肅清來犯的海盜，得到使臣、巡檢等官職。應時與方氏兄弟熟識，與宗厚的關係尤佳；宗昇死於慶元六年，年五十八歲。⁵⁰王永富是餘姚四明鄉的富人，曾協助鄉里推動義役等事，是孫應時友人趙景孟岳家的姻親。⁵¹趙景孟亦為餘姚人，身分不詳，孫應時曾與他及女婿胡衍(晉遠)遊家鄉四明山，並且作詩唱和。⁵²高公亮是餘姚士人高國佐(一作國任)長子，幼師事孫應時同鄉且為陸九淵(1139-1193)的弟子諸葛誠之，從浙中學者游，其學行受到陸門四弟子之一的沈煥(1139-1191)賞識，由煥的岳父豐誼作主，將其甥女戴氏嫁為公亮妻。公亮曾為胡擲子胡衛的老師。開禧元年(1205)戴氏死，享年四十五歲。次年，由應時代替知於潛縣的胡衛為其撰寫墓誌銘及壙記。⁵³趙師龍(1143-1193)是宗室，自其父伯述時遷居餘姚，紹興十三年(1143)，生師龍，史浩(1106-1194)任餘姚尉時與伯述友好，師龍與史彌

47 孫應時，《燭湖集》，卷 10，〈跋司馬家藏薛紹彭臨寶章帖〉，頁 15 下-16 上。

48 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上，〈丁未仲夏賞月〉，頁 3 下-4 上。

49 司馬述，〈《燭湖集》原序〉，孫應時，《燭湖集》卷首，頁 1 下。

50 孫應時，《燭湖集》，卷 12，〈方巡檢墓誌銘〉，頁 1 上-2 下。

51 孫應時，《燭湖集》，卷 12，〈王迪功墓誌銘〉，頁 6 上-8 上。

52 孫應時，《燭湖集》，卷 18，〈二月二十伍日同趙景孟、胡晉遠遊四明山詩〉；〈和景孟宿山中〉；〈和景孟山行〉，頁 1 上-2 下。

53 孫應時，《燭湖集》卷 12，〈戴夫人墓誌銘〉，頁 16 下-18 上、25 下-26 上。

遠兄弟曾同學，⁵⁴後來與曾入太學的聞人穎達之女結婚，死於紹熙四年，享年五十一歲，夫人聞人氏(1142-1201)則死於嘉泰元年(1201)享年六十歲，生四男四女，其三女即為胡衛的妻子。⁵⁵

孫介與孫應時的妻子都是餘姚張氏，她們的身分難考，殆屬一般平民；所以如此，與孫介選擇婚姻的態度有關。孫介是一位躬行篤實，樂道知命的士人。他安貧守分，不萌非義之求，尤不選富家女為媳婦，說：「吾方以禮訓吾家，使婦挾富則閨門何觀，不如兩窮之相安也」，因此他的媳婦「皆故人寒士之女」。⁵⁶孫介的妻子張氏，父日休，餘姚人，陪嫁的奩資是十畝地，說明張氏雖不貧困，亦非富豪之家。孫應時的妻子也是同縣的張氏，以耕讀傳家，一如孫應時所說「子婦孝敬，門庭詩書，田園固薄，甘旨自如」的小康之家，應時曾在張家短暫任教席。⁵⁷張氏的大哥張伯高，是一位追求功名的未第士人，能作詩，孫應時有詩相贈，其中一首〈妻兄張伯高來訪橫河感舊與拜先君墓下有作次韻〉詩，雖無法確定時間，但大約在孫應時被罷居家時的心情寫照，二人的關係相當親密。⁵⁸

五、孫應時的同鄉陸門學友

就讀太學，開啟孫應時邁向仕途的重要里程，也讓他有機會與有志道學的士人，一齊追隨陸九淵，成為道學運動的一員。爾後，這些

54 樓鑰著，顧大朋點校，《樓鑰集》，卷 109，〈知婺州趙公墓誌銘〉，頁 1880。

55 孫應時，《燭湖集》，卷 12，〈宜人聞人氏壙記〉，頁 22 下-23 下。

56 沈煥，〈承奉郎孫君行狀〉，收入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 4 上；又見樓鑰著，顧大朋點校，《樓鑰集》，卷 114，〈承議郎孫君墓誌〉，頁 1973-1976。

57 孫應時，《燭湖集》，卷 13，〈祭外姑文〉，頁 16 下-17 上。

58 孫應時，《燭湖集》，卷 19，〈妻兄張伯高來訪橫河，感舊與拜先君墓下有作次韻〉，頁 16 上下。

追隨者因著學習典範的轉移，形成「轉益多師」的現象，伴隨著道學大儒間的競合與捲入朝政之爭，掀起南宋中期多變的政治與學術糾葛。⁵⁹孫應時和他的同鄉好友石斗文、石宗昭、諸葛誠之、諸葛受之、胡拱、胡搏兄弟，都是陸門子弟，在同鄉關係外有更緊密的聯結。

石斗文(1129-1189)、石宗昭兄弟是紹興新昌望族。石氏在宋代雖非累世巨富，卻是科舉入仕人數最多的家族之一；在乾道、淳熙年間，更與陸九淵、朱熹、陳傅良(1141-1203)、葉適、呂祖謙(1137-1181)等名儒，建立深厚的關係。⁶⁰石斗文，字天民，生於建炎三年(1129)，隆興元年進士，曾任樞密院編修官，揚州、婺州通判、知武岡軍等職，史浩、葉適都向宋廷推薦其學行。淳熙十六年死，年六十一歲。⁶¹石斗文從弟宗昭，字應之，是石晝問之子，乾道八年與陸九淵為同榜進士，曾任秘書省正字，知滁州淮南轉運副使等職，卒年不詳。斗文兄弟均為象山早期學生，象山與石氏兄弟關係密切，但二人亦與呂祖謙、朱熹等有頻繁互動。淳熙元年(1174)九月呂祖謙遊會稽之時，兄弟二人均從游。⁶²石斗文與呂祖謙、陳亮(1143-1194)的關係，甚至早於陸九淵。⁶³由於石氏兄弟的師承多元，在淳熙八年(1181)，呂祖謙逝世時，石應之以弟子身分祭告，並說：「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教，庶幾其有分寸之進者，則惟先生之教之賜，不敢忘也」，此一學術趨向的表述，引起陸九淵不滿，先後於紹熙元年給高宗商的信，及紹熙三年給孫應時的

59 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黃寬重，〈師承與轉益——以孫應時《燭湖集》中的陸門學友為例〉，頁1-64。

60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頁293-312。

61 孫應時，《燭湖集》，卷11，〈編修石公行狀〉，頁8上-9下。

62 呂祖謙，《東萊集》，卷15，〈入越錄〉，頁10上下。

63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10，〈與陳同甫〉，頁16上。繫年依杜海軍，《呂祖謙年譜》，頁178。參黃寬重，〈師承與轉益〉，頁18-24。

信中，對石應之師承的轉變，有很重的批評。⁶⁴

石氏兄弟與孫應時的關係親疏有別。淳熙元年，呂祖謙遊會稽時，孫應時與石氏兄弟均從游，但此後並無斗文與應時互動資料，僅見於淳熙十六年應時守喪時，代石宗昭撰寫斗文的行狀。⁶⁵反之，孫應時與石應之往來較多，學術理念也相近。代石宗昭寫斗文行狀，即顯示二人交情。從現存《燭湖集》中可知，紹熙元年六月下旬，孫應時給朱熹的信中說他於是年四月服喪期滿，獲調遂安，在杭州曾看到晦庵給石應之的信，知道朱熹已知漳州。⁶⁶孫應時與胡搏(崇禮)、趙師淵(幾道)，也曾受應之邀請，到雷峰塔下白蓮社飲遊。⁶⁷這年五月，石應之除校書郎。⁶⁸次年，孫應時有一書致應之，信中談到自己即將攜母赴遂安任縣令，及得知應之「拜守滁之命」的消息。都說明在這一時期中，二人的互動頻繁。⁶⁹慶元三年(1197)九月，孫應時在常熟，回石應之的信，提到自己的遭遇、友人潘友文、劉允濟動態，及應之將任淮東轉運副使的消息，又說：「若兄事任既重，盡心其職，可以報國而及民者方大。人各有志，勢難盡同，自靖而已，遑多議乎。」⁷⁰可以和朱熹於同年給石應之的信，提到自己老病及黨禁：「猶恨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瞑之深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

⁶⁴ 陸九淵，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卷 14，〈與高應朝〉，頁 188；卷 15，〈與孫季和〉，頁 195-196。

⁶⁵ 孫應時，《燭湖集》，卷 11，〈編修石公行狀〉，頁 8 上-9 下。

⁶⁶ 孫應時，《燭湖集》，卷 5，〈上晦庵朱先生書三〉，頁 3 上。

⁶⁷ 孫應時，《燭湖集》，卷 14，〈石應之校書招同胡搏崇禮、趙幾道飲白蓮社晚酒〉，頁 16 下-17 上。

⁶⁸ 陳騏，《南宋館閣續錄》，卷 8，〈校書郎〉，頁 28 下。

⁶⁹ 孫應時，《燭湖集》卷 5，〈與石檢詳書〉，頁 18 上-19 上。

⁷⁰ 孫應時，《燭湖集》，卷 5，〈與石檢詳書〉，頁 19 下。

哉！」相互印證。⁷¹顯示石應之可能在慶元黨禁期間，政治態度轉變，積極謀求仕進，招來昔日同黨的非議，以致孫應時要以「人各有志」來寬慰他。石應之轉任淮西提刑後，不久去世，確實的年月不詳，孫應時在〈挽石應之提刑〉文中，除盛讚他在兩淮的功業，「德意人人浹，工夫事事新」之外，也感念孫應時知常熟為庶務所困的最艱難時期，「勤勤慰我窮」的深情。⁷²後來，孫應時在友人周叔何處，見到昔日石應之與諸友唱和詩，曾作詩感懷。⁷³

諸葛誠之兄弟也是孫應時的陸門同鄉學友。諸葛千能，字誠之，是南宋初獻書朝廷的會稽藏書家諸葛行仁的族人，與孫應時同郡但異縣，幼年並無來往。乾道八年孫應時入太學，兩人才成為同學，且一起師從陸九淵，都是陸門的早期弟子。象山對誠之向學之心十分欣賞，多加勸勉，視之為忠誠的追隨者。淳熙八年誠之中進士，僅見的任官紀錄是嘉興縣主簿，曾參與知平江府羅點的救災事務，獲得羅點的倚重，亦曾以鄉居士人的身分，請朱熹置倉及減和絹以紓民困，受到朱熹的讚賞。誠之在學術上，除師從陸九淵外，亦與呂祖謙、朱熹有所來往，甚至欲消弭朱陸兩派之間的緊張關係，大約死於淳熙十六年。孫應時有長文致祭，歷數二人自太學以來，長達十五、六年的深厚情誼，說二人「同州異縣，一合一離，義重金石，情通墳簞」，特別對淳熙九年(1182)以後二人的遭遇與相互關懷的情誼，有很深的描述，顯示二人的交情甚篤。⁷⁴

⁷¹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 54，〈答石應之二〉，頁 2547。

⁷² 孫應時，《燭湖集》，卷 16，〈挽石應之提刑〉，頁 9 上下。

⁷³ 孫應時，《燭湖集》，卷 15，〈頃過周叔和見故人石應之詩，及諸賢和篇大軸，邀余繼韻，久不暇遣，因通五夫諸李文書，劃然有懷，走筆寄之。叔和括蒼人，今居五夫，面山臨流，頗幽勝，予甲寅歲嘗和潘端叔一詩，即此韻，不知唱首為叔和作也〉，頁 20 上下。

⁷⁴ 孫應時，《燭湖集》，卷 13，〈祭諸葛誠之文〉，頁 7 下-8 下。

諸葛誠之有兄弟受之、壽之以及行之等人，都是陸九淵的門人，但資料零散，難以了解完整的生平事蹟，目前僅知象山有書致受之，批評他「反己未切，省己未深」。⁷⁵諸葛千齡，字壽之，曾於淳熙元年與孫應時、石應之等，陪同呂祖謙遊丁氏園。⁷⁶壽之死於何時不詳，孫應時有挽文，說二人：「過從十年足，惻歎一家情，無力寬貧病，傳書隔死生，西風吹客淚，萬里寸心明」，時間似乎是應時在四川期間。⁷⁷行之資料見紹熙二年(1191)冬，應時在致象山的第二封信中說，象山的書信是由諸葛行之傳來，⁷⁸孫應時也有詩和諸葛行之。⁷⁹

孫應時與胡氏家族的關係，是在兩代既有師生情誼之上，進一步成為道學學友，甚至聯姻，關係更加密切。但這一個階段，以胡拱、胡擢兄弟為主。

胡家在政壇上的代表性人物是胡宗伋的長子胡沂(1107-1174)。胡沂，字周伯，生於徽宗大觀元年(1107)，自幼聰穎，宗伋對他未來有很高的期望，因此認真引導。宣和五年宗伋夫妻攜年十七歲的胡沂到開封補入太學，追求科舉功名。胡沂勤奮為學，七年金人攻入汴京，仍閉戶讀書，後才與父母倉促返鄉。紹興五年(1135)，中汪應辰榜進士。入仕之後在州縣職務浮沈超過二十年，至紹興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始被召為秘書省正字，⁸⁰三十年任吏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⁸¹同年五月，遭母喪。後於孝宗朝(1162-1189)擔國子司業鄧王

⁷⁵ 陸九淵，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卷3，〈與諸葛受之〉，頁45；參見卷36，〈年譜〉，頁489。

⁷⁶ 呂祖謙，《東萊集》，卷15，〈入越錄〉，頁6。

⁷⁷ 孫應時，《燭湖集》，卷17，〈挽諸葛壽之文〉，頁3上下。

⁷⁸ 孫應時，《燭湖集》，卷6，〈上象山陸先生書〉，頁10下。

⁷⁹ 孫應時，《燭湖集》，卷17，〈和諸葛行之〉，頁2上。

⁸⁰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70，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頁3294。

⁸¹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84，紹興三十年三月，頁3720。

府直講、殿中侍御史；因批龍大淵、曾覲干政，十年間三度被劾引去。葉適稱讚他：「去必剛勇果決，其來，未嘗不遲懦退縮也。」⁸²乾道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先後拜給事中、禮部尚書兼領詹事、改侍讀，反對虞允文(1110-1174)恢復中原政策，以龍圖閣學士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十二月卒，享年六十五歲。⁸³出殯時，孝宗(1127-1194)派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1119-1199)致祭，祭文讚美其行誼：「卿祇事先帝暨朕四十年，秉心忠蓋，蒞政廉勤，嘉謨讜論，甚歡朕心，偉才卓識，深愜輿情，怯除無爽，舉用得宜。」⁸⁴

胡沂死後無諡號，光宗繼位後，因胡沂曾任太子詹事，侍光宗最久，遂由孫應時代胡摶擬請諡號狀。孫應時在狀中稱胡沂在太學時「險阻艱難，義不忘君」，秦檜(1090-1155)專政時「恬處選調踰二十年，中居言路，排抑貴倖，發於忠愛」，孝宗「每有忠實不阿附之褒」。⁸⁵先諡獻簡，改獻肅。⁸⁶胡沂妻子鄭氏是太府卿鄭作肅之女，生五子：振、拱、挺、摶、括，及一女。

胡沂在高、孝二朝的政治表現，固是胡宗伋教養成功，也讓胡氏家族成為當時浙東的名門望族。但由於他先期沈浮州縣吏事，後來又多居朝廷，與長期居鄉，致力教育的孫家，關係較為疏遠。在胡沂職

⁸² 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卷 12，〈胡尚書奏議序〉，頁 223。又胡沂在乾道七年(1171)知處州時，曾奉朝廷之命，訂定義役的規約，推行於全國。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 7，〈處州義役〉，頁 2 下-4 上；見王德毅，〈南宋義役考〉，頁 241。

⁸³ 脫脫，《宋史》，卷 388，〈胡沂傳〉，頁 25580。

⁸⁴ 胡臨川編，《餘姚柏山胡氏宗譜》，卷首，〈獻肅公事實節要〉，頁 8。

⁸⁵ 孫應時，《燭湖集》，卷 1，〈代請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胡沂諡狀〉，頁 10 上。

⁸⁶ 王明清，《揮塵錄》，後錄卷 5，〈文臣諡〉，頁 137-139；王太岳，《四庫全書考證》，卷 83，頁 14 上。

位最高時，孫應時尚處於追求科舉功名的準備階段；等到應時進入太學，胡沂已奉祠居鄉。胡沂逝世後一年孫應時才中進士，因此二人並無互動的紀錄，《燭湖集》中除了為胡沂求諡的奏狀外，所見的多是應時與他的兩個兒子胡拱、胡擢往來的資料。

胡拱(1140-1182)是胡沂次子，字達才，號柏山，生於高宗紹興十年八月，少穎敏，三十二年(1162)以經義科薦鄉貢第二繼入太學，接受義理之學，為名公鉅儒所推，與應時同遊象山之門。淳熙元年補授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後即丁憂去職，至四年八月監回易庫。⁸⁷淳熙八年，史浩向孝宗推薦「懷才抱識，沈伏下僚而未能自達」的十五位臣僚，指胡拱「沈厚似沂，而拱行尤峻，安恬守道，不願人知」；⁸⁸同知樞密院事葛邲(生卒年不詳，隆興元年進士)也曾論薦，但未及任用，九年八月死，享年四十四歲。⁸⁹無子，以四弟擢之子衍為嗣，後以子恩贈中散大夫。⁹⁰

胡擢(1147-1195)則是胡沂的四子，字崇禮，紹興十七年(1147)生，先於乾道九年(1173)恩補承務郎，後調兼臨安府樓店務。及胡拱死，乞監西京中嶽廟，淳熙十五年任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紹熙三年充浙西提舉茶鹽幹辦公事。寧宗繼位，轉奉議郎，紹熙五年(1194)浙西水旱，崇禮運米賑災，勞苦過度，次年(慶元元年，1195)五月，以疾卒於蘇州官舍，享年四十九歲，有二子，長子衛，次子衍過繼為胡拱子。⁹¹

87 胡臨川編，《餘姚柏山胡氏宗譜》，卷首，〈柏山公事實節要〉，頁13上。

88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卷9，〈陞辭薦薛叔似等劄子〉，頁1下-2上。

89 孫應時，《燭湖集》，卷1，〈代請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胡沂諡狀〉，頁10上；卷12，〈胡提幹墳記〉，頁20下。《胡氏宗譜》作淳熙十年癸卯死，誤。

90 胡臨川編，《餘姚柏山胡氏宗譜》，卷首，〈柏山公事實節要〉，頁13上。

91 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卷17，〈胡崇禮墓誌銘〉，頁338。孫應時，《燭湖集》，卷12，〈胡提幹墳記〉，頁

胡拱、胡搏以及孫應時同為陸九淵的門生。陸九齡(1132-1180)曾記載乾道八年象山中舉後入浙，多位從游的學生中，即有胡拱。象山在兩封信中稱讚胡拱資質甚美，且有嗜學之誠，但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囑他朝夕諷詠《孟子·告子篇》、《論語》、《中庸》、《大學》等切己處。⁹²胡拱兄弟是象山學說的信徒與實踐者，是象山學說在浙東推動的重要力量，袁燮(1144-1224)〈祭胡達材〉：「維兄求師友於四方，探聖賢之淵源，不違世以立異，不同流而詭隨，恬澹自守，不求聞知，此善類所資以磨琢，而吾道賴以扶持，調降年其有永，何一往而莫追」，⁹³袁燮所指「扶持吾道」一事，葉適有更清楚描述：「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為其學尤眾。兩併笠，夜續燈，聚(胡)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周氏(崇禮妻)賢明，身治鮭菜，供飯羹，歷歲閨閨，無改其度，士既成名，無不向重崇禮。」⁹⁴顯見胡氏兄弟提供優渥環境，讓象山在浙東講學，為陸學的發展，提供了相當重要的條件，不過未見到兩兄弟傳承陸學的具體內容。此外，由於朱熹與胡沂有所往來，曾為胡宗伋寫贊，與胡家亦屬熟稔，從孫應時給朱熹的信中也可看到崇禮與朱熹多有書信往來，並曾請朱熹寫家人的墓誌，惜未實現。從這些片斷的資料，知道胡氏兄弟與朱熹的互動中，未涉及道學理念的討論，誠為傳揚陸門的重要弟子。

孫應時與胡氏兄弟的交情甚篤。除了兩家長期的師生情誼外，此時更因同為象山弟子關係更為親密。孫應時在祭諸葛誠之的文中，曾

20 上-21 下。

⁹² 陸九淵著，鐘折點校，《陸九淵集》，卷 4，〈與胡達材〉，頁 56-57。

⁹³ 袁燮，《絜齋集》，卷 22，〈祭胡達材〉，頁 12 上下。

⁹⁴ 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卷 17，〈胡崇禮墓誌銘〉，頁 338。

痛惜「達材之厚，天既奪之」。⁹⁵胡氏兄弟死後，更撰寫祭文與弔亡詩，傷至交之喪，「嗟我論交重，相知照膽明，十年離合地，今日死生情」，⁹⁶更重要的是胡拱的嗣子胡衍，是孫應時的女婿，應時在〈次女答胡氏書〉的婚書中表明兩家長久的情誼，如今親上加親，「四世百年相為師友，兩家今日遂託舅甥，豈惟祖禰之寵嘉，是謂天人之素定」。⁹⁷

胡拱逝世後，應時與胡擲的關係更為親密。光宗即位後，孫應時為崇禮撰寫請求賜胡沂的諡號狀，與胡擲、趙師淵(生卒年不詳，乾道八年進士)，接受石應之邀請遊雷峰塔。⁹⁸孫應時赴遂安縣令前，也在胡擲家與陸門弟子相聚。⁹⁹紹熙三年替胡擲致書續任浙西提舉茶鹽幹辦公事的徐姓提幹。¹⁰⁰及崇禮卒，孫應時為他寫墳記。¹⁰¹胡擲死後，其妻周氏、三女及婢女，在一個月內相繼死於異鄉(蘇州)，這時長子胡衛才十七歲、次子胡衍十一歲。面對胡擲遽逝及家變的慘況，孫應時在祭文中有很深沈的痛惜，「矧伉儷之淑惠，穆人神其無悔。併一網之不貸，呼彼蒼矣何罪。變筭女之及時，今孰期而結帨。兩兒秀而不凡，忍莫為之怙恃，賴手足之奔救，躬綜理於終事」，更追述兩代情誼及兩人的交情，「喟余家之世舊，託心交兮臭味，君於我而愈親，真異體而同氣。日春莫之過吳，兄出延而倒屣，指明年之相依，方委余以

95 孫應時，《燭湖集》，卷 13，〈祭諸葛誠之文〉，頁 8 下。

96 孫應時，《燭湖集》，卷 16，〈哭亡友胡達材〉，頁 10 下-11 上。

97 孫應時，《燭湖集》，卷 8，〈次女答胡氏書〉，頁 26 上。

98 孫應時，《燭湖集》，卷 14，〈石應之校書招同胡崇禮、趙幾道飲白蓮社晚酒〉，頁 16 下-17 上。

99 孫應時，《燭湖集》，卷 6，〈上象山陸先生書〉，頁 10 上。

100 孫應時，《燭湖集》，卷 3，〈代胡崇禮通交代徐提幹啟〉，頁 5 上下。

101 孫應時，《燭湖集》，卷 12，〈胡提幹墳記〉，頁 20 上-21 下。

其子，曾慘別之幾何，痛一朝之永已。」¹⁰²

自胡沂死後，胡氏家道明顯中落。胡沂在世時，是胡氏鼎盛時期，他留下豐富的資產，惠及胡拱、胡擲兩兄弟之外，¹⁰³更提供陸學發展的基礎。但兩兄弟未中第，以蔭補官入仕，只任初階官，到紹熙年間，家道已顯衰象。胡擲即自道：「某資材甚下，門戶早衰，亦惟升斗之所驅，固甘瓦礫之在後。」¹⁰⁴胡拱既早逝且無子嗣，胡擲也以四十九歲之年，與妻女突然病死異地，留下兩個尚在學的兒子，家道衰敗之象甚為明顯，因此，孫應時雖為胡擲寫墳記，但他的墓誌銘卻直到十九年後，即嘉定六年(1213)才由胡衛到永嘉請葉適補寫。¹⁰⁵

胡家由沒落走向興復，孫應時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基於胡、孫兩家長期師生情誼，應時接受胡擲的託付，負起教導胡衛(1179-1229)、胡衍的責任。胡衛，字衛道，是胡擲的長子，生於孝宗淳熙六年(1179)，幼受教於同鄉高公亮，¹⁰⁶娶同縣趙師龍之女。¹⁰⁷慶元四年中浙東路貢舉，次年中進士，¹⁰⁸嘉泰年間知臨安府於潛縣，四年(1204)在縣學建藏書閣，¹⁰⁹開禧二年立「三賢堂」，¹¹⁰嘉定七年(1214)由太常寺主簿，改右正言，兼侍講，次年改散中侍御史，十四年(1221)為中書舍人兼修國

¹⁰² 孫應時，《燭湖集》，卷 13，〈祭胡崇禮提幹文〉，頁 10 上-12 上。

¹⁰³ 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卷 17，〈胡崇禮墓誌銘〉，頁 337。

¹⁰⁴ 孫應時，《燭湖集》卷 3，〈代胡崇禮通交代徐提幹啟〉，頁 5 下。

¹⁰⁵ 葉適說：「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字，籠玩往復或移日。」見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卷 17，〈胡崇禮通墓誌銘〉，頁 338。

¹⁰⁶ 孫應時，《燭湖集》，卷 12，〈載夫人墳記〉，頁 25 下-26 上。

¹⁰⁷ 孫應時，《燭湖集》，卷 12，〈宜人聞人氏墳記〉，頁 22 下-23 上。

¹⁰⁸ 張溥，(寶慶)《會稽續志》，卷 6，〈進士〉，頁 7161。

¹⁰⁹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 56，〈縣學〉，頁 11 下。

¹¹⁰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 74，〈祠祀、諸縣神祀〉，頁 10 下。

史，十五年任禮部侍郎兼修國史，¹¹¹十七年臣僚劾其「南宮贊長，西掖摘文，浸通顯矣，嗜進益切，清議鄙之」，罷為宮觀，¹¹²死於紹定二年(1229)，享年五十一歲。¹¹³

胡衍是胡擲次子，過繼為胡拱之子，字晉遠，一字衍道，號松山。生於淳熙十年，胡擲死時衍才十一歲，孫應時受託擔負教養重責，《燭湖集》中留有應時給胡衍的書信，年月不詳，當在十五、六歲間，孫應時在信中對胡衍期待甚深：「近來專看何書？所作何事業？觀聖賢之學，考帝王之治體以及歷代興替隆汙之變，而達乎今日之世故，精思而默識」，要求他「一一見告，併錄所作時文數篇來，欲觀進修之益」，且勉勵他「切不可同他人，陰有自足、自用之意，驕不如己者」，並說：「僕所期待於吾子最甚，吾子宜自默喻，故因及此。作字且宜留意小楷，未宜草書，不唯年齡當然，書家法度正如此。」¹¹⁴胡衍得到胡沂的恩蔭，先授承務郎轉承事郎，慶元四年以書薦中銓，嘉泰元年以春秋義為浙東漕舉榜首，初任浙西路秀州監酒，開禧二年則改義烏丞。¹¹⁵孫應時有詩送其赴任。¹¹⁶胡衍於嘉定四年(1211)以春秋經應鎖廳試，賜同進士出身，先後出知黃巖縣、永嘉縣、改知鎮江府，十六年任撫州通判、知荊湖北路漢陽軍事兼節制兵馬，封餘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¹¹⁷胡衍為凝聚族人向心力，曾定期聚族人相會，並彙集

¹¹¹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73之49、52、58，75之24；陳騭，《南宋館閣續錄》，卷9，頁13下、19下-20上、26上。

¹¹²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73之58

¹¹³ 胡臨川編，《餘姚柏山胡氏宗譜》，卷1，〈柏山世系〉，頁4。

¹¹⁴ 孫應時，《燭湖集》，卷6，〈與胡晉遠書〉，頁12上下。

¹¹⁵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54，〈義烏重濟繡州湖碑〉，頁8下-10上。

¹¹⁶ 孫應時，《燭湖集》，卷16，〈送胡婿晉遠赴義烏丞〉，頁13下；〈送胡婿晉遠赴嘉興酒官〉，頁17上。

¹¹⁷ 胡臨川，《餘姚柏山胡氏宗譜》，卷首下，〈松山公事實節要〉頁15上。

宗譜，於撫州通判任上捐俸刻印《定翁公賢訓編類暨莫淑人家訓》，附在宗譜之後，並刻崇仁布衣贈歐陽澈(1091-1127)上宋高宗三書，來激勵忠義之氣。胡衍卒年不詳，著有《春秋發微》8卷、《經濟備對》4卷、《公餘日錄》5卷、《松山別集》6卷。¹¹⁸

六、孫應時的鄉里關懷

孫應時居鄉時間超過三十年，鄉里是他事業發展與關懷社會的基礎。對像孫應時一樣的宋代知識份子而言，追求仕宦與學術成長，是其終極目標，但他終其一生，只在地方任官，因此在他的著作中，雖多對朝政的關注，卻絕少涉及中央朝政運作的實質意見，其所關切的，更多是個人經歷及任職地方的事務。有別於在他鄉任職涉及實際政務，他對家鄉事務則多側重建言及組織協助的角色。

孫應時對鄉里事務關懷的資料，見於來往書信、記與撰寫的墓誌中，涉及的事務也相對集中於社會、文化與教育方面。孫家自孫疇、孫介以來，都投入鄉里子弟的教育工作，孫應時更受惠於紹興府學教育，由此而膺鄉舉之薦，成為獲登南宮之階，¹¹⁹因此對鄉里教育與人才培育，多所措意。實學是他所強調的，如他致汪鉅秀才的信中，痛批像汪秀才一樣的時下士人，不誦讀經書，急於求成，「中庸大學之本文，今世晚出小子，未必熟讀，其讀者亦姑惟科舉文字引用之故，豈能深求聖賢之心思，以其身踐之哉」，批評他將《中庸》、《大學》繪成簡圖的作法，「足下之急於售之，毋乃使人疑於為利者乎？世之

¹¹⁸ 胡臨川，《餘姚柏山胡氏族譜》，卷首下，〈松山公事實節要〉，頁15下-15上。

¹¹⁹ 孫應時，《燭湖集》，卷2，〈發舉謝鄉帥啟〉，頁1上-5上。

游士或依倚官府以說書醵金，僕常痛之，以為辱吾聖人之書。」¹²⁰大約在淳熙十六年，他守喪期間，有二封信致紹興縣府學的陳教授，書中表達他對府學教育的關心，指出府學自項安世(1153-1208)推動以來，稍有成績，但近三年未滿人意，因此對陳教授蒞任充滿期待。¹²¹同時推薦表現相當篤實傑出的府學學生：杜鎮、虞樞、諸葛興、孫康祖等人，以及現任的學職人員：馮幼安、諸葛尚卿，希望他能延攬入學或就職，以「有益士俗」。¹²²這封信既表示孫應時關切府學教育的發展，同時也向與自己有同年之誼的陳教授推薦自己及葉適的學生。

道學家除了性理闡釋外，也透過行動實踐道學理念。¹²³孫應時是朱、陸、呂諸大儒的門徒，相當重視推動教化的信念，特別是在他赴遂安縣時(紹熙二年)，史浩有詩勉勵他實踐道化後，更促動他努力實踐此一理念。他在蒞任後積極興學，立張栻(1133-1180)、呂祖謙祠堂，及舉辦鄉飲酒禮等彰顯儒學價值的儀式。¹²⁴紹熙三年元旦，縣學舉辦鄉飲酒禮，讓四十三年前的舊禮重現，孫應時賦詩表達「鄉飲彬彬更可傳」的欣喜之情。¹²⁵

孫應時罷任鄉居後，對於家鄉餘姚舉行飲酒禮甚為關注。開禧元年，餘姚鄉人莫叔亢參酌舊制圖繪禮儀，與縣令趙善湘(生卒年不詳，慶元二年進士)將永嘉郡學所行禮儀結合刊印，孫應時為其作序。在序中

¹²⁰ 孫應時，《燭湖集》，卷6，〈與汪垺秀才書〉，頁13上下。

¹²¹ 孫應時，《燭湖集》，卷6，〈與陳教授書〉，頁13下-14上。

¹²² 孫應時，《燭湖集》，卷6，〈與陳教授書〉，頁13下-14上。

¹²³ 孟淑惠，《朱熹及其門人的教化理念與實踐》，頁241-277。

¹²⁴ 黃寬重，〈學宦難兼——孫應時曲折多艱的生命歷程〉，頁43-45。

¹²⁵ 孫應時，《燭湖集》，卷18，〈壬子元旦，遂安縣學講書齒飲，前此四十三年，錢建為令，嘗有此集，題名在壁，是日詹本仁有詩，余和其韻〉，頁12上。關於南宋舉行鄉飲酒禮的研究，請參見山口智哉，〈南宋鄉飲酒禮考〉，頁238-252；申萬里，〈宋元鄉飲酒禮考〉，頁28-36。

梳理自古以來四種鄉飲禮儀的形式，並對南宋以來朝廷及餘姚縣府推行此禮儀的發展與變化有所說明。應時指出，自乾道以來，餘姚舉行的禮儀側重於迎接鄉賢(葉汝士)與歡送賢守(常褚與趙善湘)，¹²⁶這固能使「賢侯之令德能治士心」，但不當以此為滿足，希望能擴大範圍，讓此禮的實施，具有更深遠的意義。「繼自今不惟祖餞是循，庶幾歲時習肆，禮樂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方聞風於是取則。」¹²⁷顯示孫應時期待透過莊嚴的儀式，來傳達道學家所提倡的儒學價值。

孫應時在教育鄉里子弟之外，更希望藉由儒者的篤志與持久力行，來振興儒風，而以佛教興盛為鑑。孫應時自淳熙十一年受邀，到東湖書院教授史彌遠兄弟後，即因史浩的關係與四明杖錫寺的高僧寶曇(?-1197)，結成方外之交。寶曇有〈和孫季和遊東湖韻〉詩，當為二人結識之始，此後頗有往來。¹²⁸慶元元年孫應時出任知常熟縣，寶曇也有〈送孫季和知縣赴常熟〉詩。¹²⁹慶元三年春遊西湖，又有詩和應時。¹³⁰可見孫應時與僧人有所交往，對佛教在浙東發展，有深刻的認識。¹³¹

孫應時在二篇佛寺建興的記文中，以僧人歷經數代努力，完成佛寺的興建為例，對比佛、儒在地方社會影響力興衰的緣由。孫應時說福昌院從紹興以來，歷經惟岳、法蓮、體修幾代經營，均因「鄉土寒賸，無所貸乞」未能完成。但僧人「獨苦心強力，寸累銖積，不弛不亟」經過四十年的努力，終完成規模宏大的寺院。孫應時認為僧人的

¹²⁶ 常褚於慶元五年到任，嘉泰二年離任；趙善湘繼任至開禧元年，見周炳麟，（光緒）《餘姚縣志》，卷 18，〈職官表〉，頁 8 下。

¹²⁷ 孫應時，《燭湖集》，卷 10，〈餘姚鄉飲酒禮序〉，頁 1 上-2 下。

¹²⁸ 寶曇，《橘州文集》，卷 2，〈和孫季和遊東湖韻〉頁 9 上。

¹²⁹ 寶曇，《橘州文集》，卷 4，〈送孫季和知縣赴常熟〉頁 2 下。

¹³⁰ 寶曇，《橘州文集》，卷 4，〈次韻孫季和知縣遊西湖〉，頁 14 下。

¹³¹ 黃啟江，《南宋六文學僧紀年錄》，頁 179。。

篤志毅力，不僅是寺院可以建成的因素，也是佛教在鄉里社會取代儒學的要素，正是儒者雖百計排佛無法達成的原因。孫應時從中追溯「今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荒聚，必有佛氏之居，為之依歸，則猶三代黨庠遂序之所也。其鐘鼓儀物，諷誦講說，則猶三代絃歌鄉射之具也。儒者不能以道得民，而佛氏得之，將誰責歟，古今道術之變而關乎天地盛衰之運，將誰能任之歟？」因此抱著「凡佛之徒，盡心力於其法者，余方歎且媿焉，奚暇訾也」的心情，來看待佛教對地方影響力的深化，以警示儒者。¹³²〈法性寺記〉中，應時對自建炎四年(1130)金兵侵犯餘姚，該寺被燬之後，歷經行持、良遇、清敏、了可、清譽數代僧人的努力，再經善於領導籌畫的廣惠長達二十年經營，才完成復建工程為例，說明世事成敗的關鍵。孫應時認為事務的成敗，需數、時、人諸因素相結合，其中人的因素最為重要，「夫數與時難知，而人不可不自盡，人事果盡，則數與時皆合矣。」他從此事推衍到士大夫與國運的關係，說：「士大夫任國家之大事，如惠之勤勞，愈久而不懈矣乎！功業不建則曰時數然也，非誣天歟，噫七、八十年之間，燬而未復者可勝惜哉！」¹³³雖然應時以儒者身分「雅不道浮圖事」，¹³⁴卻一再以僧人不避辛艱，完成建寺，弘揚佛法，深入窮鄉僻壤的精神為例，惕勵儒者需持志不懈地推動儒學教化於基層社會，才能有成。

孫應時這種發揚儒學理念的態度，也表現在對表彰鄉里先賢的情懷，以顯揚家鄉的地位。孫應時認為東漢的嚴光是餘姚人，晚年耕於富春山。後來富春被劃入桐廬縣，范仲淹(989-1052)曾為表彰嚴光的志節，建祠並作記，遂使桐廬釣臺的聲名大顯；反之，嚴光實際的出生地，卻不被世人所知。孫應時據鄉土俗所記，指出嚴光活動地區多在

¹³² 孫應時，《燭湖集》，卷9，〈福昌院藏殿記〉，頁17上-18下。

¹³³ 孫應時，《燭湖集》，卷9，〈法性寺記〉，頁18下-20上。

¹³⁴ 孫應時，《燭湖集》，卷9，〈慈溪定杏復教院記〉，頁15上。

餘姚，死後也歸葬於陳山，是道地餘姚人。乾道年間，史浩任紹興太守時曾建墓道與精舍，「始告縣，表墓道，起精舍曰：客星庵，而為之田，長吏以時奉嘗」，¹³⁵後來為便利民眾往來，在大浦建石橋，名「客星橋」。孫應時作記時，即希望「先生之故里其與釣臺並傳乎，倘亦史公之志也」，特記其事刊於石，並且以詩歌傳達餘姚是嚴光的故里，來發揚鄉里的心意曰：「山川之靈兮，人為重輕，風土之傳兮，人為晦明。先生釣遊，有榮一州，先生故丘，云胡弗求，陳山雄雄，石梁崇崇，斯名斯歌，以諗四方。」¹³⁶

除了關懷鄉里教育文化的傳承，孫應時更重視鄉民的疾苦，協助推動義役，促進鄉里社會的和諧。宋代百姓稅與役的負擔均重，南渡後，長期面對金朝侵逼，既有歲幣，又需強化國防戰備，財政負荷沈重，遂藉由稅收，將負擔轉嫁於百姓；而依戶等徭民從事「職役」，項目多、責任重，久之滋生弊端，造成百姓差役的負擔增重與不均的現象，影響地方社會的和諧。各地關懷鄉里社會的官僚與當地富室、縉紳，為舒緩民眾壓力，組成不同形式的互助群體，化解官民與貧富之間的衝突，義役的推行即是其中之一。¹³⁷

紹興府近海，時受海水侵蝕，需長期維修海隄，加上為皇陵所在，帝后崩逝之後，動員護葬等，均需民力，這兩項力役的負擔都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宋孝宗深知役法不公之弊，在淳熙六年，因廷臣建議，鼓勵各地推動義役。餘姚縣亦起而響應，但因胥吏從中作梗，難以持

¹³⁵ 孫應時，《燭湖集》，卷9，〈客星橋記〉，頁26下-28上。史浩知紹興府在乾道四年(1168)，但依史浩裔孫史在鑛〈史浩年譜〉，史浩是紹興二十年三月任餘姚縣尉後，表嚴光墓道，及教育人才，「迄今姚邑遺徵猶在」。見史在鑛等修，《史氏譜錄合編》，卷2，頁5下。孫應時記載恐誤。

¹³⁶ 孫應時，《燭湖集》，卷9，〈客星橋記〉，頁26下-28上。時為慶元四年八月。

¹³⁷ 關於南宋義役，請見王德毅，〈南宋義役考〉，頁233-261。

續。孫應時從四川返鄉後有一段家居期間，對此一現象有很深觀察，並感慨鄉里未能推行，他指出「年來所至，民物凋瘵，役戶絕稀，惟義役略可救之；然議者多不主此說」，未見有效推行。為緩和鄉民的壓力，他曾以漸進的方式，先鼓勵某一都的百姓施行義役。因此，當得知施宿將接任餘姚縣令時，即致函陳告初步規劃的內容，請縣令促成此事：「某居鄉，每輒以此勸鄰曲而不敢強，今所居一都稍稍樂從，漸欲就緒，且先推一名徐宗廣者，抵替見役保副，截自三月旦為始。敢為封納其狀，且令徑拜庭下。其餘保正及稅長名次，一面排結，當以面呈，尚可領略，仍稍示主張之意，益當有繼為之者，田里小安，風俗厚矣。」¹³⁸在孫應時鼓勵下，當地富人相率加入，如「以謹信質厚為眾所敬愛」的王永富，「割膏腴倡義役以弭仇訟」。¹³⁹餘姚望族的茅宗愈，有感於賦役造成「里正多破業，仇訟不已」，當施宿倡義役時，「亟捐膏腴數十畝倡之，博盡眾謀，畫為要束，期於堅定永久」，施宿接受其議，「遂以為一縣式」。¹⁴⁰

慶元五年施宿推行義役及建海隄有成，當時任官常熟的孫應時得鄉親書信，對於施宿施政多加讚譽：「各各誦循良之政不已，如義役莊之代輸，海堤之官辦，豈惟吾邑所未有，蓋四方所罕聞也」，鄉人茅宗愈並請求應時為義役作記。¹⁴¹施宿離任後，孫應時以倡議者的身分，在〈義役記〉中對施宿組織民力、努力推動，訂定執行方案以傳諸久遠的用心，甚為推崇：「噫！侯之誠心慮民，極至於此，真不負阜陵勸行之本旨。推此心也，雖古之法度，其宏濶精密，舉後世以為

138 孫應時，《燭湖集》，卷8，〈與施監丞宿書〉，頁15下-16下。

139 孫應時，《燭湖集》，卷12，〈王迪公墓誌銘〉，頁7上。

140 孫應時，《燭湖集》，卷12，〈茅唐佐府君墓誌銘〉，頁11上下。

141 孫應時，《燭湖集》，卷8，〈與施監丞宿書〉，頁16下-17上。

難者，猶將可復，獨義役哉！」¹⁴²孫應時的倡議與施宿的推動，是居鄉士人與在任官員對鄉里社會關懷的具體顯示。孫應時在文中說他也曾打算效法施宿的作法，在常熟推動，卻無法盡其功，「條貫靡竟，遠不逮侯故，因備著侯事，私志其媿云。」¹⁴³

孫應時也藉撰寫鄉里師友墓誌，表揚這些人對教育文化及關懷鄉梓的善行，成為後來地方志標舉的對象。孫應時為時人寫的墓誌、行狀、壙記，見於《燭湖集》者總計 19 篇。此數量在南宋士人文集中並不算多，其中屬會稽人士有 11 篇，除石斗文行狀是代石應之所寫外，均與應時有直接或間接關係，這些有鄉里師友之誼者，除石斗文、胡擲任官外，均為當地富室或僅任低階官職；他們事蹟不多，資料又少，其行誼本不足傳諸後世，但透過孫應時的手筆，揭示其關心鄉里及實踐的具體事蹟。這些事蹟被收入光緒版《餘姚縣志》者，共有高國佐、莫友、趙師龍、孫洋、王永富、茅宗愈、李友仁等 7 人。¹⁴⁴

七、結論

爭取科舉功名是宋代士人擺脫庶民身分，獲取政治地位的主要方式，也是一般家族展現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因此吸引著無數個人或家族，透過教育，學習舉業。鄉里的啟蒙教育，不僅是成就舉業的基礎，更關乎每位參與者未來的生命歷程，也是以知識編織起人際關係的第一張網絡。透過教育關係所結成的網絡，讓彼此藉由師生與共同

¹⁴² 孫應時，《燭湖集》，卷 9，〈餘姚縣義役記〉，頁 23 上-25 下。

¹⁴³ 孫應時，《燭湖集》，卷 8，〈與施監丞宿書〉，頁 13 下-14 上。常熟的義役，要到端平三年(1236)才由知縣王爚正式推動。

¹⁴⁴ 周炳麟，(光緒)《餘姚縣志》，卷 23，〈列傳四·宋〉，頁 6 下-13 下；〈列傳五·宋〉，頁 5 上。

學習的機緣，促進情誼，結成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關懷鄉里社會的發展，有利於創造鄉里社會的一體感。

從孫應時的成長，見證教育在鄉里社會所形成的緊密關係。燭湖孫氏家族經歷二代，辛苦推動由農而儒的轉型，至孫應時，才告完成。促成轉變的機緣，來自鄉里先賢胡宗伋的推動和孫子昇習儒的動力，孫家透過教育，致力舉業，終能讓孫應時中舉任官，更讓孫、胡兩家，由師生情緣，提升到同道，乃至締結婚姻，經歷四世百年的相互扶持，終能在南宋科舉功名的競爭上，不絕如縷，迭有斬獲。

孫家兩代在鄉里執教，開啟他們的人際網絡。從孫疇與孫介受惠於胡宗伋的教養提攜，戮力舉業，到孫應求、孫應符及孫應時一代，不僅謀求舉業，更以鄉先生的身分，被富室聘請，教育其子弟，以此開展人際關係。當然，漂泊寄食的鄉先生生活並不穩定，卻讓孫介的兒子可以與這些富家子弟共學或互動，自幼即建立相當親密的情誼，助成其人際關係。後孫應時在家鄉，推動公共事務，如義役，能獲得有利的奧援，就肇始於同鄉師友的支持，讓他關懷鄉里的願望得以落實。而受教於孫應時的紹興青年，也與他有密切關係，尤與司馬儼、司馬述父子，兼具師生與同僚之誼，讓兩家互動密切。孫應時死後，司馬述協助《燭湖集》的出版，並為其撰寫序文。

除了受教者與教育者關係所建立的聯繫外，對孫應時而言，更特別的是他與鄉里朋友，在太學求學過程中，共同成為陸九淵的弟子，結成具有共同理念的道學同學。儘管這幾位陸門弟子，在大儒競合的環境中，師從對象未必始終如一，學習取向也有所出入，甚至在捲入南宋中期學術與政治糾葛變化後遭遇各異，但彼此情誼卻始終密切。

而孫家與胡宗伋、胡沂、胡拱、胡搏及胡衍、胡衛，四代的關係，尤能看到在環境變化下，經由教育所建立的師生之誼，進展到同學，乃至婚姻的過程，更見證兩家家境轉變後，相互扶持，共渡危難，重

振家業的情誼。胡沂固然是孝宗一朝餘姚的名臣，家業頗富，但諸子均未中舉，只以恩蔭擔任基層官員，胡拱、胡擥篤守象山之學，協助陸學在浙中發展，但兩兄弟均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孫應時感懷胡宗伋助孫家成長的教養之恩，回饋胡擥的託付，扶持胡衛、胡衍兩兄弟成長，並將次女配與胡衍，讓兩家關係昇華，維繫胡氏家族在科舉上的競爭力。胡、孫這兩家的關係，十足體現了中國鄉里社會中相互扶持的傳統。

不過，孫應時在鄉里所建立的師友及人際關係，固然對他在仕宦及學術的成長有所助益，但顯然較為間接。對照孫應時爾後在仕途的成長與變化過程中，提携、推薦，影響他更大的是史浩、陸九淵、朱熹、丘壘(1135-1208)，乃至張孝伯等人，都不是紹興人。當然，這與孫應時所處的紹興人，在政壇與學術的影響力不足有關。胡沂是當時唯一在朝任高官的紹興人，但淳熙元年即已逝世，此時孫應時尚未中舉，加上孫介並不積極攀附權貴，乃至婚姻的對象都是一般的庶民，缺乏雄厚的鄉里與婚姻作為奧援，因此，孫應時須自力營建有利於發展學術與仕途的人際關係。

孫應時推動關懷鄉里的事務，是從實踐的角度來體現，深具儒學情懷。孫應時經由教育，實現科舉功名與追求學術，同時建立人際脈絡，推動鄉里發展與公共建設。他受孫介提倡實學的影響，又受道學大儒推動教化的薰陶與史浩推行道化的鼓勵，除了到任職地區興學、講學、設祠堂、舉行鄉飲酒禮等體現儒學價值的作為之外，在家鄉藉胡沂推動義役的經驗，結合地方富室，協助地方政府推動義役及地方特色與價值，也關心鄉里儒學傳統的發揚；從文集中我們所見的各種〈記〉、〈序〉，均在傳達此一觀念。尤有甚者，他雖與當代高僧有所交往，但未必認同佛教，而是藉著撰寫僧人經歷數代不懈完成佛寺重建的精神，訴說佛教興盛的動力及儒學面臨的挑戰，以警示儒學需

要紮根於鄉里的重要原因，這都源於孫介重視實學的家教。

然而，孫應時對鄉里關懷與實踐，在他一生的事業中，份量並不重。這或許與文獻不足有關，但也可從另一個側面去了解所以致此的原因。孫應時雖然有超過一半的時間居鄉，但早年是在家鄉受教讀書，從文集的書信中，更多的是他對學術與政治事務的關心、任職地區的實務，乃至他的心情與遭遇，鮮少觸及鄉里；對鄉里社會出力最多的除了推薦學生之外，就是在義役的推動上，籌謀協調，與知縣施宿合作。慶元六年，他被罷家居，身心受挫，加上黨禁的風氣仍熾，限制了他對鄉里的關懷與推動事務的動力；但他藉著撰寫鄉里人物墓誌及不同類型的〈記〉，來表彰鄉里人物德行，並傳達他關懷所生長鄉里社會的態度，因此，雖有形事蹟不多，卻以此來寄寓其關懷鄉里。

將孫應時與同時中舉士人，如樓鑰(1137-1213)和劉宰(1166-1239)作比較，有助於了解不同類型士人，在鄉里人際關係的經營，與關懷鄉里的作法。樓鑰出身於富盛望族，他所結交的師友，多為四明大族，他所建立的深厚人脈，不僅有利於共同致力仕途的發展，晚年也以鄉賢的身分，在鄉里共同促進陸學的發展，並參與推動了影響頗為深遠的鄉飲酒禮及鄉曲義莊等彰顯地方社會特色的活動。¹⁴⁵劉宰雖非富有，且長期居鄉，但靠著他的岳父、至交的關係，以鄉紳的身分與中央大員、地方長官，及地方士人、富室，藉著地方事務，表達看法、綿密互動，更藉著撰寫大量地方人物傳記及為地方志彙集人物資料的機會，表彰這些人的善舉及鄉里社會的價值；這些舉措，都讓他可以在家鄉鎮江、金壇災荒時，結合地方民力與官府，共同推動多次大規模的賑濟活動，甚至成為當時推動賑濟的代表人物。¹⁴⁶目前關於不同類

¹⁴⁵ 參見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103-136。

¹⁴⁶ 黃寬重，〈劉宰的人際關係與社會關懷〉。

形士人的研究尚少，尤難進一步作比較；希望爾後有更多個案的探討，並進行比較研究，期有助於從整體的角度，觀察宋代士人的鄉里人際網絡與豐富多樣的地方社會活動之間的關係。

(本文於 2014 年 6 月 5 日收稿；2014 年 8 月 30 日通過刊登)

*本文撰寫期間，承蒙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鄭嘉勵先生及慈溪市志辦公室童銀舫先生、王孫榮先生，協助蒐集資料，謹致謝忱。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太岳，《四庫全書考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97-150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明清，《揮塵錄》，收入《宋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史在礦等修，《史氏譜錄合編》，收入《天津圖書館藏家譜叢書》，第 45-47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間八行堂刻本影印。
- 史浩，《鄧峰真隱漫錄》，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具乾隆年間刻本影印。
- 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出版，允晨文化總經銷，2000。
- 呂祖謙，《東萊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濂，《宋學士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本。
-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武英殿聚珍版，光緒二十五年(1899)廣雅書局刊本。
-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25-32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周炳麟，(光緒)《餘姚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 36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3，據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影印。
- 胡洪軍校注，《胡氏家訓》，慈溪：上林書社，2013，內部交流刊物。
- 胡臨川，《餘姚柏山胡氏宗譜》，民國三年(1914)惇裕堂木活字本。
- 孫仰唐，《餘姚孫境宗譜》，光緒二十五年燕翼堂活字本。
- 孫應時，《燭湖集》，嘉慶八年(1803)靜遠軒藏本。
-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民國二十五年(1936)前北平圖書館影印本複製重印。
- 袁燮，《絜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張昞，(寶慶)《會稽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寶慶元年(1225)修，嘉慶十三年(1808)刻本影印。

-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陳騭，《南宋館閣續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陸九淵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 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
- 樓鑰著，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光緒九年(1883)武林掌故叢刊本。
- 寶曇，《橘州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日本元祿十一年(1698)織田重兵衛刊本影印。

二、近人論著

- 山口智哉，〈南宋鄉飲酒禮考〉，收入劉海峰主編，《科舉制的終結與科舉學的興起》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6，頁 238-252。
- 王孫策，〈孫應時〉，收入餘姚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編，《姚江名人(古代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頁 202-207。
- 王德毅，〈南宋義役考〉，收入王德毅，《宋史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頁 233-261。
- 申萬里，〈宋元鄉飲酒禮考〉，《史學月刊》，2005：2(鄭州，2005)，頁 28-36。
-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文化，2003。
- 杜海軍，《呂祖謙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孟淑惠，《朱熹及其門人的教化理念與實踐》，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3。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
- 童銀舫，《慈溪家譜》，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 黃啟江，《南宋六文學僧記年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 黃寬重，〈學宦難兼——孫應時曲折多艱的生命歷程〉，收入柳立言主編，《近世中國之變與不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52。
- 黃寬重，〈師承與轉益——以孫應時《燭湖集》中的陸門學友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5：1(臺北，2014)，頁 1-64。
- 黃寬重，〈劉宰的人際關係與社會關懷〉，收入《日本宋代史研究會研究論文集》，第 10 集。(待刊稿)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Participation of Southern Song Literati in Local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Sun Yinshi

Kuan-chung Hua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ang Gung University

Sun Yingshi (1154-1206) was a middle level official in the mid-Southern Song. Like many literati of the Song, he met people of various types and carefully managed 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hat makes Sun unique, however, is that his book, *Zhuhu ji*, mentions more than 230 people with whom he associated and thus provides unusually ri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local activities and scholarly networks of a learned man who was not particularly famous either as a scholar or as an official. This article studies Sun's early life, his local connections, and his participation in local affairs through his family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cusing on his interactions with literati of his hometown. Among his associates, there are 147 people whose hometowns can be traced, and of these 147 people, 53 were from Shaoxing.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local network established in Sun's early lif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 and official career, and how Sun's network affected his participation in local society.

Keywords: Sun Jie, Hu Zongji, Shaoxing prefecture, personal networks in loc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local affairs